

乡村记忆

西北洼

孙景璞

家乡的西北洼在村子西北和前朱石村之间，离我村约有1.5公里，我村在那里有许多土地，有三条南北向的田间小道，其间有许多东西向的耕地。那时，偌大的耕地只有一个广新四爷爷家的水井，所以，大部分耕田靠天吃饭。

家乡人说的洼，不是低洼的“洼”，也不是“水洼”，而是远而大的意思。

在这“洼”里也有我家二亩地，这是我父亲和叔父在东北经商，省吃俭用捎来家的钱购买的。为什么买这么远的地？因为价格便宜。

当年，家里只有祖母、母亲和我，没有牲畜，耕种这么远的田有许多困难，只好和别人来“分种”。

分种地，在当时也是一种互助合作的方式，即有地户出地，有劳力的人家出牲畜和劳力，负责耕种管理，最后均分成熟的粮食。这是老祖宗留下的分配方案，应该说还是合情合理的。

我家分的粮食，都是母亲往家挑。高粱秸就往家拖。我长大了就和母亲往家抬，或者我自己挑。不怕远，就怕懒。

西北洼因为离村子远，冬季那里比较安静，正是大雁路过休息进食的好地方。

大雁是一个有纪律的群体，在空中飞翔时会呈“人”字形，落在地面上总会有一个站岗放哨的，它站在那里，高昂着头，环顾四方，如有情况，它会发出警报，群体便会立即起飞。每年农历九月上旬，过往的大雁总会来西北洼休息进食。它们在麦地里吞食麦叶，并排泄出绿色的像小手指一样的粪便。因为它们吃得快，消化得不怎么好，其粪便没什么臭味，还有麦苗的颜色。大人们就让孩子们拿着篮子去捡拾它们的粪便，拿回家来晒干后当柴烧，加以风箱吹着，火苗特旺。当年，我曾干过这活儿，满麦地里面见到就捡，半天能捡一提篮子，收获不小。

西北洼地多草，正是我拾草的好地方。

过去的耕作制度是两年三熟制。即冬小麦收获后，种大豆。大豆在霜降节前收获后，把地闲置起来，明年春天种谷子或高粱，收获谷子或高粱后，接着种冬小麦。这闲置的大豆地，就是我拾草的好地方。

过去种地不讲密植，庄稼比较稀，加之管理粗放，地里生长的杂草也不少。特别是大豆地里既有杂草又有落下黄色的豆叶，我们拾草就是拾这些杂草和落下的豆叶。

拾草所用的工具主要是铁齿草耙和提篮，还有一种用高粱秸加铁丝编成的像簸箕一样的帘子。草多的地方，就用铁草耙搂集成堆。草少的地方，就得靠走路收拢，积少成多。把草帘子用绳子绑在铁草耙下面，再用一根长绳，一头系在草耙头上，一头系在柄上，挂在肩上，手握耙柄，满地专捡草多的地方走。草在耙上集多了，就摘在帘子里，帘子里的草多了，就取出来堆在地上。这种拾草方式，我们叫“拉草”。沐浴着阳光，秋风拂面，听着那大雁的鸣叫声，看着它们那遵守纪律的队形，满地闲庭信步，没有疲劳感，反而觉得逍遥自在。

到了饭点，把所收集的草一部分装在篮子里，一部分装在帘子里，用绳子绑起来，用草耙板挑着回家，得到家长的夸赞，自己也觉得很有颜面。这也是童年生活的一个侧影，很有意义，回味无穷。

往事如昨

领带的故事

姜惠泉

我的第一条领带，是用红黄相间的丝绸料子做的，表面上滑滑软软的，里头还衬着一层硬布。那是1984年，妈妈赶新河集，花了七元钱给我买的。领带刚买回来，妈妈就想让我系上展示展示。当时没人会系领带，就照着系红领巾的法子来。妈妈围着我转了一圈，笑着说：“系上这条领带，一下子长了三分人才。”

自从有了这条领带，我几乎跟它形影不离。系在脖子上，走路都觉得不一样，仿佛真的就多了几分人才。

时间长了，我自己摸索出了系领带的法子。对着镜子一遍遍地练，手笨，绕来绕去总是不对，急了就扯下来重来。后来有一天，忽然就系成了，端端正正一个结。我对着镜子看了半天，又跑到妈妈跟前。她笑着端详了一阵，说：“像那么回事了。”

就在这年冬天，姐姐结婚了。结婚当天快到中午了，接亲的车还没来，妈妈和一众亲朋急得团团转。我决定到姐夫家去看看。姐夫家是邻村，翻过西边的埠顶子就到。这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举动，可我顾不了许多，气冲冲出了门。本家一位爷爷怕我去闹事，一路跟在后边，边走边劝：“今天是你姐姐大喜的日子，千万别闹出笑话。”我说：“爷爷您放心，我就是去看看。”

刚进胡同口，帮喜的人看见我，就把我请进家里。我对姐姐的公爹说明了来意。他是村支书，从别处借了辆吉普车当婚车。他说：“刚来电话，车子一会儿就到。”我听了，就要告辞，这时姐夫从屋里出来，脖子上挂着一条没系好的领带，一脸为难地说：“一屋子人没一个会系的，你帮我系上。”我接过来，三下两下系好。他照着镜子整了整，冲我笑了笑。我转身往回赶，把情况告诉了爸妈，他们悬着的心才算放下了。

前些日子跟外甥女聊天，还说起这件事。她听了之后，睁大眼睛问：“这是真的？”得到姐姐肯定的答复，她笑得前仰后合。

1988年，我到了染织二厂供应科，干采购，常跑大连染料厂买紧俏化工染料。有一次办完事，路过“秋林百货”，就想进去转转。

一进门，只见锃光瓦亮的货架上摆满了各种进口商品，我的眼睛都不够用了，跟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似的。正转着，远处金利来货架上的领带吸引了我的目光。柜台里那条红底蓝丝线的领带，标价五十四元。那时我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元，在柜台前转了两圈，咬了咬牙，买了。

那年秋天，堂兄言成结婚。当天，他系着一条和我那条一模一样的金利来领带，我猜是妈妈借给他的。他见我没吭声，故意把领带从西装里抽出来，笑着说：“看，我也买了条金利来领带。”我说：“咱们这儿还没有卖金利来的商场。”他愣了一下，随即哈哈大笑起来。

后来，我又买了两条领带。一条是在大连的步行街买的，花了十六元，是纯天蓝色的；另一条是在哈尔滨买的，花了二十元，是深蓝色带金丝线的。

1990年的一天，厂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说：“小姜，给我一条领带用。”我赶忙从行李箱拿出那条深蓝色带金丝线的领带，给他送过去。他看了一眼我手里那条，摇摇头，下巴朝我领口抬了抬：“我要你系的这条。”

屋里静了一瞬，我的手在领带上停住了，指尖触到那层细密的金丝——不到两年，它已经贴熟了我脖颈的弧度，系结时该留几分松紧，抬手时它会往哪边偏，我都知道。可拒绝的话在喉咙里滚了滚，终究没出口。

我从脖子上解下来，双手递过去。他没接，只是转过身，微微仰起脖子。我上前一步，替他系上，系得很慢。领结打好的那一刻，镜子里两道影子一前一后，他端详着自己，我端详着那条领带。他整了整衣领，说了声“好”，便低下头去看桌上的文件。我站了片刻，退出办公室。

1992年，我来烟台工作，又在百货大楼花二百多元买了一条领带，跟送给厂长的那条很相似。2000年之后，我几乎每年都买一条领带，当是给自己的新年礼物。价钱从七八百元涨到两千元，买了不下十条，可大多挂在柜子里，系的机会并不多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系领带的人越来越少了。先是单位开大会，满屋子人，系领带的只剩下主席台上那几位。后来主席台上的人也不系了，偶尔有人系一条，倒像是忘了摘下来似的。再后来，街上也几乎看不到了。有一回，我系着领带去逛商场，迎面走来一个小伙子，盯着我脖子看了两眼，那眼神，竟像是在看一件出土文物。

前几年到南方参加经销商会议，往返数千公里，只遇到一个和我一样系着领带的人。从那以后，我系领带的次数也少了，不过每到过年时、参加婚礼或其他重要场合，我还是会系上一条。系上它，仿佛回到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里。

老烟台饮水往事

木刀

烟台濒临大海，淡水资源不足，境内河流多为季节性的，大海阳河、西南河、东河等都曾经是一方百姓的用水命脉。随着农业进步，村落集中形成，百姓聚居生活，打井取水逐渐成了百姓的主要选择。自南宋至明清时期，烟台民众普遍饮用井水、泉水，基本不再取用河水。

清末，大街小巷出现了一些忙碌的送水人，他们的运输工具是地排车，车上有木制的长方体或者圆桶形水箱。他们拉车到郊外河流上游优质的水源地取水，送水到户。送水人的出现，一方面是因为男丁在外务工不便去水井打水，另一方面是因为有些人不习惯“井泉水”。当时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很大的水缸，送水人会直接倒水入缸，价钱是按担计算的，一担水是几分钱几厘钱。

作为我国北方开埠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，外来人口迅猛增长，烟台的城市规模扩大，有限的井泉逐渐满足不了需求。这时，西方的管道输送水源技术传入，局部区域出现了少量的自来水管道供水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宫家岛等水厂相继兴建，烟台市区逐渐进入了自来水的普及和推广时期。

烟台的自来水公司早期主要为工厂供水，向居民供水并不能做到通水到户，而是在一定的居住半径内，由政府埋设了供水管线，在人口集中的地方安装水栓。砖砌的供水点高一米、长宽各七八十厘米，里面的水管用海草做了保温，水阀的开启杆在方台子上面，用钢管做成的龙头伸出在正前方。为了防止“跑冒滴漏”，政府为每家每户发了开水阀用的铁扳手，无论谁去担水必须带着这个扳手，接完水就随即关闭。有的年份，水资源紧张，为了节约用水，当时还实行了定时供应，一天只有几个小时可以供水。这时，水栓旁往往会排起长队，一大溜儿全是水桶。

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伴随着烟台市区的城市改造，大多数人住进了楼房，真正享受到了自来水进家的喜悦。如今的烟台城区，早已不见了河流上的大小石桥和木桥，不见了水流在石滩上清澈见底的旧日景象。那些关于井台、水栓和送水人的记忆，也渐渐沉入岁月深处。